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0期

华忆图书专辑（一）

【编者按】

耳语者与吹哨人

【李锐题辞】

这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呐喊，中国人决不允许文革的灾难重演！

【论文集序跋】

沈迈克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启 之 编者前言/编后记

【论文集第一卷】

文献与综述

推荐语：李锐、（美国）宋永毅、（美）魏昂德、（美）王复兴

目 录

【论文集第二卷】

思想与文化

推荐语：钱理群、（美）李洁、（香港）彭丽君、（澳）何与怀

目 录

【论文集第三卷】

学校与地方

推荐语：秦晖、（德）文浩，（美）乔晞华、（加）吴一庆

目 录

【论文集第四卷】

政治与群众

推荐语：杨继绳、（法）潘鸣啸、（奥地利）魏格林、郑仲兵

目 录

【本刊声明】

【编者按】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全四卷）是为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2016）而编辑的，可直到2019年11月，在文革发动53年之际，它才在美国姗姗问世。其直接原因虽然缘于香港立项方的撤项撤资，但究其根源，实为大陆禁言文革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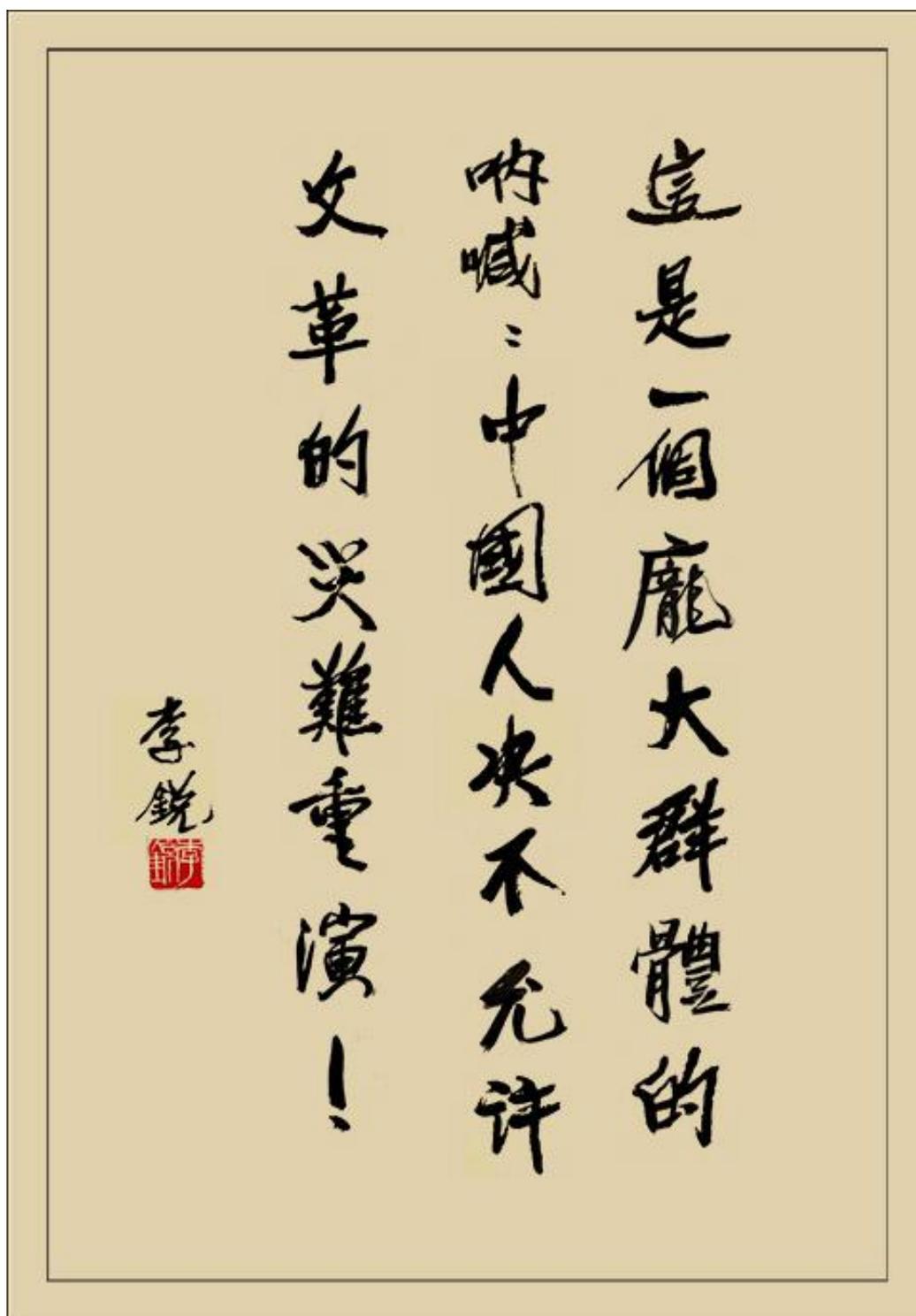
长期以来，年轻一代对这种禁言不以为忤，甚至认为此举有利于安定团结。新冠病毒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禁谈历史，自然也会禁谈现实。昨天禁言文革，今天就会禁言疫情，就会把说真话的医生说成是造谣者。其结果就是让疫情蔓延，国家受辱，人民受难。

禁言的本质是拒绝真相，禁言的要害是违背宪法。“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机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心中的斯大林主义。”（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理想早已破灭，恐惧仍旧藏在人们心里。老一代拒绝回首当年，新生代不谈国事历史，党政干部不敢妄议大政，学者教授成了双面人。“吹哨人”成了维稳之敌，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只能在家里向亲人悄悄地发发牢骚。

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无须“耳语”，欢迎“吹哨”。打压“吹哨人”，就是封杀真相，就是祸国殃民。当国人为疫情的“吹哨人”献上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文革的研究者同样是“吹哨人”，他们是在警示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毛的覆辙。

顺便说一句，这套书是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的，华忆者“追忆似水年华，汇聚妙手文章”是也。这家出版社的特殊之处是，它不但提供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缩写：ISBN），还提供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号码（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Number，缩写：LCCN）。后者意味着，它出版的书，会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收藏，而美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都会因此而购买、收藏此书。📖

【李锐题辞】



【论文集序跋】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序

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短，算得上成果的东西不多，也就一二本书以及若干文章而已。借用陈伯达常说的一句话，我不过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名“小小老百姓”而已。不过，主编先生诚邀我为此煌煌四卷作序，“小小老百姓”虽然不胜惶恐，但也只得向鲁迅学习，写一篇“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维护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者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

九年前(2009年4月27日下午)，我在清华大学文北楼的309室演讲时，谈到了两种文革研究者：一种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目前的形势好得很，可能还越来越好。证据是，一些重点大学开设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另一些人则是相当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形势糟得很，而且会越来越糟。理由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了，说真话的文章无处发表，且年轻的一代对历史明显缺乏兴趣。

九年后，当我为这本书写序言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悲观主义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们的远见卓识在今天都一一落到了实处——大学开设的文革课被叫停，有关文革的著作完全无法出版，研究文革的博士们毕业就得改行。这本论文集从香港转战台湾，直到逃到海外才落户。

不过，忆苦思甜会让我们从悲凉之雾中走出来——四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汽车拉我们去看了一场名为《沙漠的春天》的电影。我们留学生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很糟糕，简直傻透了。回学校的途中，我在校车后排找到了老师，想跟他交流交流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说：“老师，您得承认，今天这部电影真不怎么样。”老师跟我打起了官腔：“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延安文艺

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按照 1957 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来判断，这部电影好极了。经过文革的锻炼，特别是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性第一位、艺术性第二位把握得很好。”虽然他的逻辑我能听懂，但我当时还年轻，我在想，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但是那位老师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现在的中国，还会拍《沙漠的春天》吗？还会有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老师吗？还会用这种荒唐的逻辑为傻透了的作品辩护吗？不会，完全不会了。今天中国的银幕上，放的是好莱坞大片；中国的电视上，放的是“跨界喜剧王”；今天大学的教师们，最喜欢妄议国政。今天盛行的逻辑是以一元统率多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这么一番今昔对比，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中国有了巨大且惊人的进步。

正是这一进步，使这本论文集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成为可能。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掩盖言论管制的严酷现实，也并不是对曲线出书的艰难困苦视而不见。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学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这么说，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这四卷本，不就是成绩？不就是光明？不就是中国同仁勇气的凝聚吗？

随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关于毛时代的有价值的学术出版物的日渐稀少，这本论文集的价值更加突出。它成为备受期待的、毛时代文献的重要补充。这洋洋百万言，是中国学者们严肃的研究成果——这里的“严肃”并不意味着冷峻、枯燥或者沉闷，而是尽责、真实和坚定的体现。这里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高校、科研院所批准的学术课题，也不是国家拨款支持的研究项目，而是来自民间、业余、退休的作者之手。在这些作者中，有耄耋老人，有年轻的八零后，有业余写作的史学教授，有改行从文的工程师。从文革的参与者到外部的观察者，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如同《记忆》一样，这本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它记录了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到山高皇帝远的边疆、从乌合之众的暴力到“三支两军”的维稳、从集体的大屠杀到文艺的雅俗体制等一切内容。而对于此书的主编而言，这本书则代表着孤身的耕耘和韧性的苦干，意味着数年心血的付出和无数小时的付出。

2006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位研究文革的著名中国

学者指出：“文革研究断档，后继乏人……在最应该了解文革的人群（大学生、研究生）之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失忆的一代’，而文革则会成为‘失传的学问’。”（吴迪，引自郝建编《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今天，摆着各位面前的这四卷本的论文集告诉我们：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非但没有断档，而且八零后，九零后已经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当文革六十周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将成为学术主力。只不过，他们得学会游击战，而且要不断地转移阵地。

二

四十年前，在复旦念书的时候，我最讨厌上政治课，尤其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课——辞典上的解释，修正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改。可在课堂上，我们不但要批判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还要拿起笔做刀枪，批判宋江、孔老二，以及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这些古人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与修正主义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政治老师要求我们批电影《武训传》，有位胆大的同学（就是在《记忆》第四期中《197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出现的那位瑞典学生，叶XX）提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看了电影再批。老师马上驳斥了他的这种反动谬论：这条语录不能用在地方，因为毛主席也说过这个电影是坏的，它就是糟得很，同学们要相信毛主席。

为了逃避政治课，我把自己锁到四号楼（现已拆）的男厕里，可是老师还是用钥匙开了门，把我找过去上课。那时我很苦闷，怀疑自己来到这个怪地方，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这只是私字一闪念，我很快就战胜了逃跑主义，决定留下——我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这个奇怪的国家，它是怎样的制度？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想看看，它到底能奇怪到何种程度，它的奇怪有没有极限？三十年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写在我和老马合著的那本《毛最后的革命》一书之中。

我的答案大部分来自于政治史。如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还会有新的解释。此书主编对此深有体会：“人亡政息，但文化不息。……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群

众运动、新生事物消失了，但是，它的精神仍旧活着人心之中，而且版本更新，升级换代：梁家河取代了韶山冲，输出革命变成了输出模式，‘艰难探索’取代了‘十年浩劫’，歌德效忠继续奏响主旋律，毛时代的文艺母题提升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革命传统加冕为文化软实力……。乌托邦走了，中国梦来了；‘群专’关张，‘喝茶’兴旺；梁效臭了，贾桂吃香；无法闭关锁国，就搞媒体管制，网络封杀，海关检查；放下了阶级斗争，捡起了‘预防式管控’；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邓氏的实用主义，承袭了毛式的不择手段……。”

当年毛泽东从需要出发，生造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则欣然接受了这个新词儿，当造反派利用这个新词儿，把他们批得七死八活的时候，他们仍旧拥护这个“强为之名”。其实，真正名副其实地“革”了中国文化之“命”的，并不是当年走上街头“破四旧”的青年或喜欢折腾的激进分子，而是毛后这四十年盲目“改革”，因为它不但在“破”字上狠下工夫，而且还在“立”字上立了新功！还好，这本论文集的第二卷集中了十五篇文章，专门讨论文革文化。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创举。以往的论文集总是把政治看成老大，排在第一；把文化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不点儿，排到老末。最近几年，文化的身价看涨，四个自信之中，就有一个文化自信；五个创新之中，就有一个文化创新。政治是硬气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文化是软实力——“温水煮青蛙”，“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三

五年前，我曾经给《记忆》写过一封信，全文如下——

《记忆》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好！

在多种多样的有关文革中的惨案报道中，提到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提到非正常死亡的工人的文章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一类人太普通，他们的“命”被认为不太值钱呢？还是因为前一类人“名”气大，所以纪念他（她）之死的“历史意义”更大？

琢磨了一两周后，我觉得不妨试试用两张档案中的故纸来校正“纠偏”这个“主旋律”。毫无疑问，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死难，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文革也害死了更多的工人、农民等草根民众。附上的名单是我从潘家园的小贩那里买到的，它们仅仅是一大堆详细史料的冰山一角。我相信，尽管是一角，也足以提醒我们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忘记民间悲剧！

编安！

沈迈克 2月18日

这封信，作为读者来信刊发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记忆》第 94 期上，第 95 期刊登了我附上的名单。尽管，《记忆》此后没有刊发同类的名单，但是，它做了类似的事——刊登了一些草根的回忆录，记载下了毛泽东时代带给这些人的苦难。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文集中的地方文革卷，这些作者多来自民间，出身草根，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是，他们的优势——亲身的经验，广泛的人脉，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以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足以使这些养老金领取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罕见，也最优秀的史学家。

刘少奇写过好多文章，最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现在已经成了对这位国家主席的反讽。刘少奇说过好多话，留给今天的，大概只有他跟王光美说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往常对我是个空洞的概念，而在这卷中，我体会到了它具体而实在的含义。

四

每人都会会有一个与别人意义不同的文革——脑子里的、肚子上的、书架上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轰动神州学界的新观点，说文革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还说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文革不光有一个，也不光有两个，而是有上万个。在这里万是“极言其多”。

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文革，也不能把文革单独揪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批斗。那是“懒汉哲学”。文革不是孤立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革是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年当中，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小部分。同时，还不要忘了，文革也是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大语境中研

究文革，才不至于滥竽充数。

“懒汉哲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把文革当成一抓就灵的工具。不管谈什么问题，只要一贴上文革二字，似乎就迎刃而解。文革成了“解释”和褒贬当代中国史的“捷径”。有了它，发挥它，可以绕过或避免接触很多棘手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因果关系，本来是应该认真追究和实事求是地解释的，但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或不肯这样做，于是，干脆“赖”到文革身上。古代叙利亚有个阿里巴巴，今日的学界没有，以为喊一声“芝麻开门”，学术的大门就会打开，历史的答案就尽现眼前，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种简单化的办法。

应该琢磨的是，作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那一“整块”该怎么去理解和概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名言，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2018年10月3日

【论文集序跋】

编者前言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北大国政系、历史系利用11月的一个周末悄悄地组织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周一，有司即要求组织者交出与会者的名单。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独立研究者口耳相传，于3月下旬在北京密云开了三天会，会后编了一本集子。私人出资，美国溪流出版，只带进来十六本。

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美、德、法、澳、日、香港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回忆录纷纷出版。国内封会禁声，文革研究者唯有诉诸笔墨。此论文集远赴美国付梓，迟至2019年问世。出书后，作者看不见样书，读者买不到纸版，带书回国，海关罚没——呜呼，“厉害了，我的国！”

—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官家的方志专史，多政治而少学术，重应景而轻长久。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单位史和地方史，在闺阁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官府。这三个转向的关键在作者。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归纳为“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40后和50后占了一大半，这些人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多为当年的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二是老者多。百分之七十的作者年纪在古稀上下，他们均已退休。少数人吃低保，大多数是养老金领取者。三是业余多。这些作者所学专业与史学无关，其中理工出身者不在少数，周孜仁毕业于重庆大学，学的是电机专业。杜钧福北大物理系出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生，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受控聚变”。石名岗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毕业，学的是机械制造，干的是锅炉，职称是高工。蒋健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教的是“过程计算机控制系统”，研究项目是“卫星导航”。他们的专业离

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60、70后少。在近五十位作者中，这一年龄段的只有五人，比80后少一半。尽管人在体制内，吃的是专业饭，但是，他们的文革研究被限制，课程被取消，学术成果无处发表。有关研究只能在下面悄悄进行，专业也成了业余。

这“三多一少”意味着，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亲历者、老而退休者和业余者之手。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

本书分四卷，第一卷“文献与综述”、第二卷“思想与文化”、第三卷“高校与地方”、第四卷“政治与群众”。收文56篇，共计150余万字。作者以大陆学人为主，也包括港台和欧美澳的华裔学者，意在展示中华学人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第一卷“文献与综述”，分两类。一类是对文革研究成果的全景式扫描，如，王芳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和徐友渔的《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20年进展综述》，前者集录英文成果，后者专注中文资

讯，二者稍有交叉，或可互补。另一类是专题性的概括与述评。如蒋健的《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周孜仁的《文革集体屠杀述要》、丁东的《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卜伟华的《各省区市地方文革简述》，杨隽的《北京“老红卫兵”研究》。后者之中，填补空白的是成岗的《文革时期的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余汝信的《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和吴迪的《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成文将文革中的省级干部分为地方（其中支持文革、领头造反的叫“革命干部”）、军队和群众三类。在介绍这三类干部的“山头”和政治态度后，作者将革委会成立前后各省一把手的情况做了梳理：一、文革前的29个省区党委书记，有26人被打倒或下台，占总数的90%，说明“走资派”占多数。二、文革前有军衔的干部担任一把手的占总数的17%。革委会成立后，军队干部增加到20个，占到总数的近69%，说明军队势力崛起。三、从1967年5月到1968年，军队干部在革委会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从16%--66%--85%。说明局面越来越难控制。四、在20个军队干部出身的革委会主任中，四野人最多（9人）。说明四野干部的地位特殊。接下来，成文介绍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革命干部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中立了新功；军队干部则从不理解——高层在“二月逆流”中抵制文革，基层在“二月镇反”中挑战文革——到支左紧跟。关于群众干部，作者以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徐景贤、陈永贵、李顺达为代表，讲了他们的造反原因和经过。文章最后概述了这些人的命运：军干退出地方政权，革干、群干被淘汰出局，劳模淡出，“三种人”遭到清洗，“走资派”成了“还乡团”。这些人的结局似乎应和了杨继绳的观点：官僚集团胜利了，毛失败了，造反派承担了失败的后果。

这些年，香港出了不少文革名人的回忆录。对中共军队与文革关系有着专门研究的香港学者余汝信，对境外出版的文革书籍也有着深入的考察。其《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一文，介绍了原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包括其子陈晓农）、王力、戚本禹三人1993至2016年间撰写的五本著作。通过勘查比较，作者指出“这些著作披露了被官方扭曲或屏蔽的若干重要史实，对人们了解文革的内情有莫大帮助，但也存在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只谈‘好’事不涉‘坏’事，对自身言行的撇清等这一口述回忆类史料常见的缺陷。”

作者澄清了王力所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指出了陈晓农对陈伯达回忆录的改写，纠正了戚本禹关于“秘密窃听”和“严慰冰案”的编造。作者提醒人们：父子对话类的作品，如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邱会作之子程光的《心灵的对话》，存在着以作者自己的思维重塑父辈形象等问题，难以作为严肃史料使用。文章最后指出：虽然陈、王、戚对文革的看法不同，但是，他们的回忆提供了不同于官方的、可供研判的有用信息。这里面有个规律：回忆的真实性，与作者反省的程度成正比。

在独立的文革研究中，地方史是一大片洼地。除了内蒙、山西、天津、上海之外，其它省区尚无系统、完整的地方文革史。到哪里去找资料？各省区都有哪些文革著述？特点如何？哪些人在研究？有哪些成果？举凡有关地方文革研究中的问题，庶几可在《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中找到解答。作者提供的资讯虽然远不够完整全面，但这项庞杂繁琐、没人重视的工作，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开端。

三

文革政治永远是学界与坊间的热门，一个毛泽东就能说上一千年。但是，真正对现实中国有影响的，不是中南海内外的权谋和争斗，而是毛时代的那套思想观念、制度规范、社会风习、集体无意识。文革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文革不但砸烂了旧世界，还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思想、制度、文化是一棵藤上的瓜。

解剖这个“瓜”，深挖这根“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大体上循着思想和文化这两个方向展开。李泽厚对古今思想史的梳理，王若水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李洪林对思想运动史的勾勒，何家栋、黎澍对封建残余的论述，何方对延安整风及个人崇拜的分析，曾彦修对中苏体制的比较，张宣三、盛禹九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唐少杰对东欧新马代表人物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著作的评介等等，都是从思想入手，探索文革的源头。

王学泰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李慎之对这一成果的高度肯定，朱厚泽对“党文化”的思考，钱理群对“毛泽东文化”和“新的国民性”的辨析、叶维丽、马笑东关于红色大院的回忆，戴伟、罗治、唐燕等人对“红色教育”追问，则是从制度、风习切入，剖析“毛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虽有不少有识之士，步老一辈的后尘“剖瓜挖藤”，但是，从思想/文化方面研究文革，始终是支流小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海外学者避短扬长，早就把文革文化列为重要的研究领域，阐释空间巨大，足以发挥其审美体验的文革文艺，是多数研究者的兴趣所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王斑从个体经验出发，以“新左派”观点为理论支撑，深情地赞美了文革中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在高度肯定文革的同时，对改革开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春苗》、《决裂》、《年轻的一代》等文革电影体现了对特权阶级的批判、对社会平等的追求。”《海港》体现了劳动者的国际主义情感。”“朝鲜影片《苹果收获的季节》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前提下，以社会平等为目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的爆发蕴含了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与校正。”“七十年代的戛然而止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干扰了七十年代开始的这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近二十年来，中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并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开发“崛起”为亚洲新的超级大国，这种径路背离了七十年代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想，也背离了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初衷。”¹奥克兰大学教授保罗·克拉克在其著作中以更宏大的学术雄心，分门别类地讲述了文革中的各种文艺产品的生产、传播和“商品化”过程，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江青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文化的现代化。文革期间，多样性的文化不但大量生产，而且不断地发展创新，而老百姓也以巨大的热情消费着这种新文化²。无独有偶，海德堡大学教授芭芭拉·梅嘉乐则在其获奖的著作中³，通过各种途径强调“文革文化体验的多样性、复杂性甚至“真实性”。与努力推翻“八亿人八个样板戏”的保罗一样，这位新生代女学者对“文革文化中的创造、解放和叛逆色彩”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大胆想像。⁴这些研究成果与国内的新老“左派”相呼应，使国内学界“剖瓜挖藤”的工作受到了困扰，为中国文化的清理和重建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亡政息，但文化不息。就此言之，没有邓小平时代，只有后毛时代。也就是说，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新生事物消失了，但是，它的精神仍旧活

¹ 见傅蕾：《文革文化中的视听艺术——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读后》，《记忆》237期（2018年10月15日）。参见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n Wang,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ism: Films and Opera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aul Clark, Laikwan Pang, and Tsan-Huang Tsai (eds),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85-106.。

² 保罗·克拉克 (Paul Clark): 《中国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P2-P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³ 芭芭拉·梅嘉乐 (Barbara Mittle): 《继续革命：解读文革文化》(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⁴ 孔锐才：《大众体验的迷失——评梅嘉乐的〈继续革命：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读书》2014年10月。

着人心之中，而且版本更新，升级换代：梁家河取代了韶山冲，输出革命变成了输出模式，“艰难探索”取代了“十年浩劫”，歌德效忠继续奏响主旋律，毛时代的文艺母题提升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加冕为文化软实力……。乌托邦走了，中国梦来了；“群专”关张，“喝茶”兴旺；梁效臭了，贾桂吃香；无法闭关锁国，就搞媒体管制，网络封杀，海关检查；放下了阶级斗争，捡起了“关口前移”和“预防式管控”⁵；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邓氏的实用主义，承袭了毛式的不择手段……。

表层现象之下，藏着深层心理；钱理群认为这是“新的国民性”——

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⁶。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依赖话语。毛泽东文化是中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系统共同生产，合力推出的产品。文革不过是将它推向了极端。因此，研究文革的思想文化要把十七年包括在内。第二，后毛时代为“新的国民性”添加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舞台。因此，“新的国民性”应该成为文革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本论文集的意义之一，就是它第一次集中地探讨了“毛泽东文化”，解释了后毛泽东时代“版本更新”的由来。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这句调侃之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化研究本来就包罗万象；二是跨学科现象在这里普遍而活跃。社会学、文艺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美学、思想史等等，许多社科人文学科都与文化有交叉。从表面上看，这一卷装的东西也确实庞杂：日记、小说、绘画、电影、“大民主”、写作组、道歉和解、文艺母题、文物古迹、身体与心理等等，但是，作者们通过这

⁵ “预防式管控”是香港大学教授阎小骏的提法，他认为，后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主要依靠弹性的“政权吸纳”和刚性的“预防式管控”。后者“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见《中国何以稳定》页 23-24，香港：三联，2017。

⁶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页 15，台湾，联经，2012。

些表象，揭示了文革文化的架构和思想观念。

样板戏始终是文革文艺研究的一大热门。西方学者更把它当作“红色文化”的代表而大书特书。但是，很少有人探究生产样板戏的文化体制。杨健从毛时代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体制入手，发现了文革文艺的雅俗二元结构——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是“宫廷雅部”和以“工农兵文艺”为代表的是“民间俗部”。前者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权威，后者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工具。二者建构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等级。文革凭什么“文化创新”？凭的就是这个理念和体制。诸如此类的，令人脑洞大开的创见，杨文中还有不少。

很多人认为“四大”（“大民主”）一无是处，很多人又怀念“四大”，把它作为歌颂毛时代的理由。赵园以其特有的随笔式风格，谈了群众的“自发性”，谈了官方的“去政治”，谈了“四大”的悖论——不但不能包容“异端”，甚至不能容忍“另类”。无独有偶，吴思在谈“超极权”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吴思所说的“大民主”侧重于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他所说的悖论是“真正的民主将摧毁大民主，进而像苏联、东欧那样推翻极权制度。”（见第四卷，吴思的《“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

赵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是对“四大”功效的分析。作者告诉人们，“四大”（尤其是大字报）揭露了干部的特权，戳穿了“为人民服务”的假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恩怨，撕下了政治的神秘帷幕，促使人们去寻求历史真相。它还把高层的“黑话”来了一个大暴光，启发人们对体制、主义和现实做深入的思考。“后文革”的精神危机、信仰缺失，近缘即在“四大”的“揭秘”。但是，“四大”也“使人之于人的怨毒与嫉恨，得到了恣意释放的机会。”这一释放浸渍着社会风气，文革后继续发酵。

姜学斋之文，可以看做是对赵园的补充。他首先剖析了革命大批判的论证方法。并以毛泽东的《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以及毛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论为例，指出毛的“非常论证法”和断言法，违背逻辑。前者以绝对化、简单化为特征。后者则是没有论证，只有结论；没有说理，只有断言的“印象式点评”。这两种方法发展到文革，成了“大民主”主要的说理方式。大批判能持续十多年，端赖媒体配合。配合之法一是“围剿”，二是“对比”。大批判令人厌烦，但是人们烦的只是那不变的语气、腔调和词汇。它的论证方法以及这方法后面的

思想体系，仍旧是在人们的厌烦之中深入人心。

姜文还谈到了写作组、群众组织和媒体在大批判中的作用。写作组是毛晚年的一种执政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宣教机构，写作组的任务是重新解释历史。群众组织是写作组的补充，其传播平台众多，传播手段灵活多样，信息覆盖面大。其全盛期的影响不逊于只能依赖官办报刊的写作组。关于写作组的问题，金光耀在《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文有更专门的讨论，可以与此文互参。

好多知青坚持“青春无悔”，很多老革命（包括“两头真”）也无悔当初。你问他：如果你知道后来会有大跃进，会饿死几千万人，会发生十年浩劫，你还会投身革命吗？这些老人十之八九，都会像李慎之那么回答：我还会选择这条路。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什么认知？徐贲在《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中做了解答：“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信仰越是幻灭，或者越是意识到信仰的荒诞，越是可能会坚持这个信仰（行为或看法），这二者之间是失调的。坚持信仰其实是削弱失调感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思想指的是毛正确的思想，不包括毛错误的思想。不能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也不能用前 30 年否定后 30 年……。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充斥当下。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徐贲一针见血：这是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这种思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并以为都正确的想法或信念。”“双重思想”是“认知失调”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是洗脑的结果，洗得越彻底，持此思想者就越会对这些矛盾麻木不仁。

顺便说一句，在解剖毛文化的华裔学者中，徐贲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博览覃思，熟悉西学，善用他山之石，剖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其书其文，常有启蒙振聩之功，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物质、风习、制度和思想、心态等文化诸层面自由穿行且融会贯通者，是《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的作者单少杰。他为本卷贡献的是《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的是红卫兵刨坟鞭尸的虐行，中篇讲的是暴民毁佛，愚众造神；下篇讲的是文革遗风：“唯成败论”与“猫论哲学”，“政治戏子”与“戏子文化”。之所以将此文置于本卷之首，是因为作者通过某些物态的文化现象，揭橥真相，针砭时弊，通幽洞微，深入到心理和精神层面。

四

文革是从学校开始的，各地的大中专校院在文革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亲自扶持的北大、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北京高校。举凡文革中的重大问题：文革与社教的关系，中共上层的分歧和动向，群众运动的兴衰，知识群体的表现和遭遇，斗批改的开展和结局，工军宣队的作用以及“教育革命”的后果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一窗口，一窥究竟。

然而，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这些学校都在回避、掩饰、歪曲这段历史。北大校史馆除了编写《校史馆展览导读》和一百年前的史料外，没有拿出一部与文革有关的东西。而由副校长、党委书记王学珍挂帅编撰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在将反右至文革的历史粗略化处理的同时，还站在派性立场上，制造了多处错漏讹误。北大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是化腐朽为神迹，把毛时代的折腾美化为“在曲折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这是该书第八章的题目）。

清华为迎接90周年校庆，由校史和校志两个单位编出了两本包括文革的书：《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出版社，2011），和《清华大学志（1911—2010）》（清华出版社，2001）。但是，这种“忠实、全面地记载了清华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的重磅级图书，对文革十年仍是欲言又止。校方组织编写的三卷本150多万字的清华校史（1911-1949，1949-1978，1978—今）。在第二卷中设了专章，用了七万多字讲了清华在“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但是，书稿审查多年不获通过，该书主编，原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孙殷望，抱憾而逝。

《北京师范大学记事（1902~2011）》（北师大党委办、校长办编，北师大出版社，2012）是校方为纪念建校110周年编写的纪事体校史著作。这部记载学校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成就的大书，只用了14页就打发了文革十年。校史上的重大事件：1966年谭厚兰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工作组的进驻与撤离，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师大的活动被掩蔽。1967年震惊高层的9.7事件，1968年7月火烧工五楼也被悄悄抹去，至于被迫害致死亡者则无一字提及。

上述情况意味着，要留下本校真实完整的文革史，只能靠民间的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近年来，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四中、北师大二附中、清华、北大、地院、北师大、人大、复旦等校的文革亲历者，纷纷加入民间著史的队伍，日记、

回忆、文集、评论、大事记、史料整理、非正常死亡统计等各类书籍文章，充盈坊间。仅《记忆》就刊发了60期（包括中学）的学校文革专辑。

这些文字的特点是回忆多，分析少；史料多，研究少；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虽然在学术上不那么“高大尚”，但是很有代表性。北大哲学系李清昆的文章，让我们知道了北大社教与“第一张大字报”之间的联系；清华大学唐少杰谈清华“教育革命”的文章，提供了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样板。北师大刘明对该校文革特点的总结，对认识一般高校的文革有普遍意义。

五

在文革研究中，地方文革是一个更大的空白。29个省市自治区，有本地区文革史的寥寥无几。换一句话说，在文革通史方面，民间成果占了主流，而在地方史方面，则是官方的一统天下。

就中共最重视的“生存权”而言，仅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就没有任何一个省区市做过统计。被迫害致死而留下姓名的，只是老干部和贤达名士、教授大家。平民大众，草根黔首，尤其是那些“政治贱民”，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正是因为没有普遍而权威的统计，歌颂文革，怀念毛时代才有了现实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年一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由全国五百余党史研究者撰稿，稿件中对各省市死难人数多有述及。此书编毕而不准印刷。最应该，也最有能力做这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哪怕是最粗简的文革死难者数字，而官吏则在“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尽量掩盖这场浩劫对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这本论文集的另一个价值，就是第一次将地方文革研究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上日程。旨在凝聚散落在各地的民间学者，为他们搭建起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推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从而为填补上述空白提供可能。这一卷收入的文章，分别研讨了山西、山东、陕西、河北、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新疆等省区的文革历史。

晋鲁两省的文革研究，领先全国。三年前，当我读到自印书《文革中的山西》时，就不禁为民间的卧虎藏龙而感慨。这次编书，我特意邀请此书的作者石名岗、李辅赐稿。虽然从未谋面，但二位慨然应允。李辅的《“一月革命”风暴：山西

夺权》一文，详细地讲述了1967年1月刘格平在中央的授意下，向山西省委夺权的过程。石名岗的《文革后的文革——山西的“倒清查”运动》一文，叙述了“四人帮”垮台之后，以王谦为首的山西省委打着“揭批清”的旗号，在陈永贵的支持下，对支持谢振华、反对“四人帮”和所谓“反大寨”的干部、群众进行的“倒清查”。李、石之文揭示了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文革的责任主要应由上层来负，而掌权者多嫁祸于下层。二、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不是看当事人在文革中的表现，而是看其清查时担任的职务。由此导致了真正的“三种人”逃脱法网，而反“四人帮”的人却成了清查对象。

研究山东文革的学者，在诸省区中人数最多，学历最高。这一卷收入了一内一外，一中一青的两篇文章。张业赏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山东文革的第一人，其博论写的就是山东文革。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简述》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山东省革委会产生的背景、过程、人员构成和组织机构的演变。对革委会的性质、职能、与军队的关系，以及在经济中的作用，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同是研究山东文革，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崔金珂，将目光投向了造反干部的派性。作者认为，文革使以前隐藏在干部内部的派性公开化、大众化；宗派主义成为省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个舞台上，是干部，而不是学生和工人，成为造反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山东的案例说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右派干部在运动初期对于造反行为的支持，成为造反派政权稳定局势的重要的内部条件。而造反派政权与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宗派主义联系，则为其提供了外部的夺权合法性。问题是，正是由于内外宗派主义联系的变化和地方派性政治的冲突发展，严重影响了造反派政权的走向。”

安徽是地方文革研究中的弱项。董国强、李嘉树以其《从“夺权”到“军管”——安徽文革运动初探》填补了空白。两位作者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梳理了中央和地方各种政治势力在特定的制度和框架中进行的互动。安徽群众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两派围绕夺权和“支左”的纷争，以及中央、省市、驻军诸方领导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影响，构成了此文的主体。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文革意识形态自身的模糊性，和不同阶段政策导向的自相矛盾，是导致那些原本具有相同社会身份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和个人不断分化重组的关键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与十年文革相伴始终。9作者的

这一观点，与社会学“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或有相类之处。

地方史和单位史的最小单位，在农村是生产队，在城镇是居委会。刘小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一文，为这一微观研究举行了奠基礼。作者依据燎原居民革委会留存的大量原始文件，就这一组织的结构与职能，做了多角度的考察，并以“四清”、“清队”、“一打三反”三个政治运动为对象，集中揭示了居民革委会主导下的“政治运动与人员清查”之间的关系。

作者指出：居民革委会既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也是“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组织保证。尽管只是城市基层社会一个细胞，居民革委会同样会给民众造成严重的伤害。文革中制造的大批的冤、假、错案，有相当部分出自包括家庭妇女的普通民众之手。

四川文革的重点在成都和重庆，重庆文革的重点是武斗。法国洛林大学博士迟淼以其传播学专业的敏锐，将研究重点投向了武斗中的死者。她的《记录无名者》一文，从时间、空间、死亡原因三个维度揭示出《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编撰者在收录死难者时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棘手难点和模糊地带。根据具体事例，作者提出一些新概念，如“时间中的时间”、“后死亡时间”等。虽然这些概念有待检验，但这种将哲学视角引入文革史学研究的尝试值得鼓励。

云南文革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是“沙甸事件”。四十多年来，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评论等文献资料已经不少。周孜仁根据自己的亲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辨析了这些记述的真伪，为这一事件梳理出一个更清晰的源流、真相和结局。

作者指出，沙甸事件是从1960年代以来民族政策左转的必然产物，“四清”工作队强行关闭清真寺是事件的导因，这一事件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和云南文革两派之争纠缠在一起。派斗因素和民族因素相互激荡，最后酿成了用军队剿灭平民的国家暴力。

陕西文革隐密而诡谲，而研究陕西文革的学者，唯白磊一人而已。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白磊以其《革命的纷争：1966-1968年西安造反派别的兴起与分化》一文揭开了隐藏在尘埃之中的历史，叙述了1966年至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西安地区发生的众多事件与各种势力的纷争，再现了文革第一阶段的陕西历史。

在河北文革的研究者中，余汝信是一重镇。他在《河北“三支两军”述略》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三支两军”在河北开展的过程和其中的问题。其贡献在于，“一般被视为造反派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在河北地区的支左中，陈伯达却站在支持保守派的多数军事单位一边，对三十八军多有指责。这一现象，打破了我们曾经固化的思维，诱发了我们更广角度的思考——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展阅此卷诸文，让我们有理由欣慰于将来，地方文革研究的前景似乎并不像有些人估计的那样暗淡。刘小萌、迟淼、崔金珂、白磊、孙言诚等人之作，虽然仅为一文，但有着奠基性和方法论的意义。某些省区，如江苏、安徽、云南、青海，在不久的将来，都有望独立成书，成为地方史著作中的领跑者。

单少杰指出：文革不是“国难”而是“国耻”。“国难”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最好方式，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有一本王友琴式的《文革死难者》，每个省区都立一块杨继绳式的“墓碑”。本卷的历史学家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这本书，修建着这块碑。

六

第四卷政治与群众。这是文革研究中最持久、最热闹、最有争议、因此也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大体上围绕着“高层政治”和“群众运动”两个层面展开。高层政治复杂且隐密，在资料封锁，档案冻结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利用公开的资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难题，也是挑战。

何蜀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一文，接受了这个挑战。通过梳理“资反路线”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毛时代由褒到贬的演变，作者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毛的辞典中从来就是一个含糊多变的概念。“资反路线”同样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准确含义的，仅仅为了一时政治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概念。毛“炮打司令部”加给这条路线最核心、最具体的罪名只是“压制不同意见”，而“压制不同意见”恰恰是毛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大法宝。

印红标对文革的“三次发动”的发现，唐少杰关于文革特色的描述，余汝信

对军队与文革关系的研判等文，对精英政治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在群众运动的研究中，红卫兵是恒久话题。米鹤都以社会学的“权威主义人格”为理论支撑，分析了“老兵”现代迷信的思想来源。作者对“老兵”崇拜心理与民众的“东方红”情结的区分，最有理论价值。米鹤都讲的是整体，袁梦倩讲的是个案——武汉红卫兵李乾打死两个所谓“流氓”，被判20年。出狱后，李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作者的采访。根据这些文本，作者探讨了历史创伤的体验与修复，施害者的忏悔与反思，事件的真相与追责。关于“忏悔机制”的分析是文中的亮点。

上山下乡一直是群众运动研究中的热门，刘小萌利用官方档案、统计数据，以及新编方志中的相关史料，对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进而探究知青“受迫害”现象与“非正常死亡”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文革时期官方语境下的知青“受迫害”问题，主要指侵犯知青人身权益的各类刑事案件，而不包括在“阶级斗争”理论教唆下，专制权力对知青实施的政治“迫害”。正是这一点，集中反映出文革当权者在处理知青“非正常死亡”案件时的严重局限。

孙佳雯，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博士，像她的导师，著名汉学家潘鸣啸一样，一直关注着上山下乡运动。她关于黑龙江与云南兵团的比较研究，避易就难，另辟天地。在对两个兵团的历史、构成、行政机构与知青群体进行了全面比较之后，她指出了两个兵团在集体性格上的差异，并且用社会学的方法，建构了一个知青群体的“差序层级”模型，用“集体记忆”的理论论证了南北

两个兵团的历史形象与两地知青分别的精神面貌。在这部四卷本文集之中，能够提供新的研究方法的作者不多，孙佳雯是其一。

关于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造反派一直受重视，保守派受冷落。李逊的《保守派浅论》可谓空谷足音，适足引起人们对这一派别的重视。而金大陆对“上海工总司”文献的解读，则为造反派研究开辟了新路。

最后，要说一说吴思的《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在这四卷本中，成思想体系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单少杰的《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篇就是这篇。在我近年来看到的专业文章中，此文至少有四个之最：一最宏观，二最全面，三最富理论色彩，四最简括。说它最宏观，指的是作者站在两套思想体系，两种社会模式的高度观察文革。说它最全面，是因为作者不但考察了文革的政治，

还考察了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他对极权与超极权塑造的新人进行了区分，认为“新人有两个层次。一是极权层次，二是超极权层次。”其中对两种新人的描述和定位颇有新意）。说它最具理论色彩，是因为作者建构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超极权”（领袖、官僚集团与群众的三角结构）。据此，作者对历史做了新颖独到的解释（“文革是以极权秩序为超越对象，以超极权秩序为建构目标的政治运动”，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但“双脱离”——既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官僚。而且是“双损害”——既损害了官僚，也损害了群众。）作者提出、借用了一些新概念、新术语（将以前提出的“官家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比较；用电脑术语将超极权的现实版分成 2.2-2.5 和 2.8 五种版本）。说它最简括，是因为此文行文简约，观点概括，尚未展开，仅是提纲。

七

我开头提到了作者队伍的“三多一少”，到 2026 年，文革六十周年的时候，这时的“三多一少”就会变成“半多两少”——30 后（86--96 岁）全部退出，40 后（76--86 岁）基本退出，50 后（66--76 岁）还能继续著书立说的恐怕要减少一半以上。60 后、70 后本来就少，难以担当主力。那时的主力应该是 80 后，他们的年纪在 36-46 岁之间，正是治学的好时候。

但现实不容乐观。国内的 80 后博士毕业就得改行，能在业余坚持下去的风毛麟角。不管国人怎么痛心疾首，“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将成为长久的事实。被认为一定会成为“显学”的文革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成为超冷门。清代的文字狱之火，由顺治点燃，在康乾手里成了燎原之势，其威力垂百年。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固然鼓舞人心，但历史的换季非人寿可期。

于是，有清一朝学人，不再指望春天，而回到了远古，躲进了考据。经世之学，反思之作只留给了隐姓埋名，年近垂暮的“清初三大家”。“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有先贤在前，有责任在肩，无论怎样冰封雪飘，无论怎么寒风怒号，修建长城的民族，总会有“知耻而后勇”者。👍

【论文集序跋】

编后记

我本来是这本书的组稿人，它的序跋、编辑、校对、排版、书封，邀名人赐序，请专家写推荐语，以及联系出版、支付费用，等等，本来是立项方的事，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最后摊到我头上，是一个曲折的故事。两年来，我一直不想把它公之于世，一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二是不想累及立项方。

使我改变念头的，首先要归功于首善之区的“预防性管控”⁷——自2016年以来，我被多次约谈，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准研究文革。前不久的某个晚上，两辆警车，七八条汉子，光临寒舍，让我交出海外友人寄来的一本“文革群众运动”的书。此后，单位的四位领导，又找我谈话。说我如果不听警告，领导也要倒霉。我盘算，既然已经给人家添了这么多麻烦，再添它一点半点也无伤大雅。

让我改变念头的另一个动力，来自立项方。它让我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看到了堂皇外衣下的利己与怯懦，看到了优越感养育的无信与无良。立项方在香港，上有“一国两制”的政策保护，下有基金会的经济支持，既无“喝茶”之虑，更无禁言之忧。我那累及他人的担心，纯属自做多情。

—

2016年8月，香港某基金会召集内地学者开会，决定为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立项出资，出版一部文革论文集。立项方邀我为此书的组稿人。我深感荣幸，决心不负重托——这部书所承载的社会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论文集。它在用笔墨重申一个常识：历史不能掩饰，言说不能禁止。立项方不但有胆有识，而且出手大方，当即给了我五万元组稿费。

要请人赐稿，就得付人家稿费。立项方初拟千字百元。我不同意，第一，内地研究文革困难重重，作者坚守阵地，应该付较多的稿费。第二，香港《二十一世纪》的稿费千字港币148元。论文集的稿费不能低于它。立项方接受我的意见，将稿费提高到千字二百元。

⁷ 这个术语来自阎小骏的《中国何以稳定》，（中国社科出版社，2017）。同样的意思，用我单位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话讲，则叫“关口前移”。我之所以强调首善之区，是因为外省的民间文革研究者并没有得到任何“预防式管控”。这似乎表明，各省区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落实与北京有很大的差异。

随后，我以基金会的名义，给国内外的华裔文革学者发函征稿。半月后，有关方面找我谈话：第一，不准为这本书组稿，第二，文革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最后，要我写一交代材料，说明与基金会的关系。

我十六岁在萨拉齐北大狱就写过交代材料，对于怎么推卸责任，怎么保护朋友，怎么让它又臭又长，让人不忍卒读，略有经验。在一万多字的交代中，我从网上摘引了八千字的材料，说明这个基金会多么合法，多么光明正大，有多少利国利民的业绩，又有多少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共襄其事。最后，我把所有的事一一从立项创意到寄发征稿函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我眼看欧美澳加港台都在开会研讨文革，出书纪念文革，而文革的原产地却装聋做哑，不让开会，不让出书。我想编一论文集，一者告诉世界，中国学界的良心还没被狗吃了。二者告诉当局，文革的亲历者“人还在，心未死”，要让他们把十年浩劫变成艰难探索，是办不到的。但是，请人家写文章得付稿费，而我一没钱二没权，听说这个基金会出过这方面的书，就拉大旗做虎皮，把人家写到了征稿函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基金会跟此事无关。

我没觉得这么做多么义薄云天，因为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文革是中央彻底否定的，我写写文章，编编文集，即便为当局所不乐见，也顶多是喝喝茶，谈谈话而已。立项方信得过我，我不能连累人家。令人欣慰的是，有司居然接受了我这番跑风漏气的解释。

我把交代材料发给立项方——并不是想邀功，只是想跟他们通通气，对对口供。立项方对我的表现并无正面评价，倒是对我以基金会的名义约稿不以为然。我不禁心怀不满：既然是你们立项出资，我当然要以你们的名义征稿。再说，你们事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不能用基金会的名义约稿。立项方再没有深责，只是问我，是否还愿意做下去？我说，既然约了稿，当然得做下去。我反问，你们要是不想做，我把组稿费退回。立项方表示无此必要。

二

此后，我全力投入此事。稿子纷至沓来，来稿情况，删汰标准，以及与专家们讨论的结果，我都一一写给了立项方和他的助理。令我不解的是，所有的信件皆无回应。在多半年的时间里，我仿佛一只离群孤雁，前途茫茫，心里慌慌，但

又不能向作者们流露，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做下去。直至2017年年中，立项方垂询此事。我才如释重负。

不久，立项方要我到香港开会，我得以认识了基金会的学术顾问丁教授。丁是哈佛博士，听过老麦（麦克考法尔）的课。据立项方说，他写过两本政治学专著，都是基金会出钱资助。他在澳洲某大学当过客座，主讲文革史，在香港科大开此课二十多年，殊为难能可贵。立项方决定请他做论文集的主编。

我对香港学术人士知之甚少。但对丁教授还有印象。我看过他为《毛最后的革命》写的序。而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洋酒的鉴赏力。百度上说，“他至少喝过上千种葡萄酒，对葡萄酒的鉴赏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准。……每次聚会时选酒的任务都落在了他头上。”而丁教授为这个“选酒大使”的差事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对于洋酒、葡萄酒的了解，能够达到让那些西方人都认可的程度，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

席间，丁教授以不屑的口吻谈了几篇大陆学者的文稿，一派法官判案的口气。他的杀伐决断，让我大吃一惊——这样的人当主编，作者情何以堪？而被他棒杀者的撤稿，也证实了我的担心。

回北京后，我咨询了几位文革学者，请他们谈谈对丁的看法。有的说，看到过他写的安徽宣城武斗的回忆文章。有的说，知道他在品酒上有很高的造诣，曾在一次红二代聚会的宴会上，显示了超人的实力——鉴定出宴会提供的所有茅台全是假货。徐友渔的回信最有针对性：“在四十多年的研究中，文革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团队。团队中人有两个标准，一是专门的学术著作，二是学术会议的邀请。丁达不到这个标准。”最让我吃惊的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反应：“该人虽然获得哈大文凭，但并非真儒，说白了是经商人士，曾经努力推广洋酒。”而沈夫人郭教授则告诉我，在台湾出了《毛最后的革命》的中译本之后，香港星克尔出版社看到此书有钱可赚，没跟迈克打招呼，就出了此书的港版中译，而写序的丁教授言不及义，仅以吹老麦为务。如果不是看在老麦的面子上，迈克会把星克尔和丁教授告上法庭。

看来，研究中国的老麦也染上了中国人的毛病——他不愿意得罪香港出版商，背着沈迈克跟星克尔做了交易。

三

2017年6—8月间，我两次给立项方写信，提出丁不宜做主编。“思想文化的稿件是本书独有，我担心他会伤害我的作者。”立项方回信说，他编了四十多本书，从来没有这么难。我回了一封长信（2017-9-8），对立项方提出批评——

1. 在用人上，缺乏知人之明。这主要表现在对丁教授的盲目偏爱与倚重上面。丁是真情率性之人，处世无城府，待人少算计，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作为朋友，其性格或有可爱之处。但是，如果请他做学术把关，则欠考虑。首先，丁于文革是外行，而他又没有自知之明。其所出主意，鲁莽灭裂，审评文章，浮皮潦草；所写意见，笼统空泛。其次，他的长项是效忠上峰，短处是不能团结同道。表现在不了解情况，就指手划脚。对作者没有体恤之心，态度生硬。作者写文章很辛苦，编者要尊重作者的劳动，在协商的基础上，给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的修改意见要具体。而丁先生只知道为王前驱，毫不顾及后果。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写的审稿意见，大兄不看，对丁这个外行的说法，却奉为指南。丁的主意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而老兄以为全对。丁既无专业又无时间，匆匆翻检，就轻率地发表意见。大兄拿来传达，让人错以为是大兄的意见。大兄要找人把关，一定要找内行。

2. 在论事上，时有蒙蔽之见。两个明显的例子：（1）大兄多次说丁教授在海外讲了20多年文革史的课，很了不起。这是误判。吴一庆、王爱和等人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都在海外讲文革，带研究生。事情明摆着，在海外讲文革是受学校学生欢迎之事。大兄把这算做丁先生的壮举。这是对丁的偏爱，蒙住了大兄睿智的眼睛。（2）我用国际学界通用的“双向匿名法”，请七八位地方史的研究者审读某学者的文章。这些人提出了修改意见。大兄却主观地认为，这些人是门户之见。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其门户之见从何而来？

3. 在策划上，或前后不一，或不切实际。举一个例子：大兄一直要求组宏观的、“面”上的文章，说地方史是微观，是“点”。为此，我退了多篇地方史的稿子。后来丁教授又说地方史要单立一卷，大兄改口附和。我只好重新组稿。而此时离截稿期只剩下一个半月，为了调动作者的积极性，我只能说好话，陪笑脸，先付稿费。即使这样，一个半月也写不出文章来，截稿时间不得不后延。

4. 在组织上，松散模糊，无章可循。(1) 事先没有协议合同，对相关人士的责权利没有任何说明。组稿有分工而无落实。上海的半壁江山，如果不是我主动找二金孙沛东李逊等人，就完全失掉。编辑小组是个摆设，丁发来的指导意见，除了前两条还有点意义外，其余要么是空话，要么没法执行。(2)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找不到联系人，写信不回，给鲁女士打电话又百般推诿。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早知道是这种情况，这个活儿我肯定不接，如果早知道有这么多不干事，又有话语权的婆婆，我早就撒手不干了。

三天后，立项方回信，大意是，对我的批评，他不想做什么解释，说者有心，闻者足戒。我被他的宽容大度所感所惑，不禁毛遂自荐：丁教授无法也不屑于跟内地的作者联系，这种隔山买牛的主编方式，不但耽误事，而且会伤害作者。因此，与其让丁当主编，不如我当主编。立项方答应暂不设主编。

按立项方的意思，我将全书分为四卷。为了保证质量，我向立项方请示，国际学界通行“双向匿名评审制”。这么多稿件，如何取舍，最好请各方面的专家把关审稿，并把几位专家的学术简历发送过去。立项方问我审稿费多少钱？我问了清华的朋友，告诉他，审稿费是稿费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不等，也就是千字20元至40元。全书140万字，28万元稿费，百分之十是两万八千元。立项方慨然应允。此后我将来稿分门别类发给专家。收到他们的评语后，打包转给立项方。凡是专家通过的，我通知作者，其文已被选中。对没有过关的，则去信解释，请其另行处理。2017年7月，我把审定的57篇稿件，140多万字的书稿移交立项方后，与作者们一道，静候佳音。

四

2018年2月14日上午，立项方约见，告我，四卷论文集，每卷提供6—8页的图片。由我、丁教授和林先生组成编辑小组。各卷目录由我和林决定。林、丁把稿子分为优秀、需要修改、需要大改和退稿四等。林、丁认为印红标、唐少杰、何蜀、李逊、丁东、吴思等人的文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修改或退稿。他们打算七月出书，在此前，作者需要做三件事：一给出版社写授权书，二按出版社的标准重做文章的注释，三提供各人的学术简历。

2018年6月底，立项方约见。我不在北京，请他写信。立项方说，等见面再说。不久，一内部人士向我透露，立项方和出版社将四卷压成了一卷（后来又说明两卷）。我闻讯大惊，这意味着，经专家评审通过的书稿，绝大部分将被删汰。这违背了立项方的承诺，对作者不公平，对评审人不尊重，而在立项方所谓的“三人小组”里，我连替作者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充其量是个上情下达的角色。

虽然我无力回天，但不能背这个言而无信的黑锅。于是，我通知所有作者，把简历寄给出版社和立项方。我不再管此事。同时，我通知立项方，此书我不署名，不写序跋。但请他们信守承诺，重新考虑稿子的取舍。

八月初，林先生来信，责怪我没打招呼即让作者发去简历，令其措手不及。我告诉他：我已跟立项方说过多次，不宜请丁做审稿人。如果非要用他，他至少应该做两件事，第一跟内地的评审人交换意见，第二告诉作者删汰他们文章的理由。信中，我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丁是外行，并且引用了我在2017年8、9月间给立项方的信。这封信我抄送给丁教授，迄今未得他一字辩解和反驳。

随后，我建议立项方另找出版社。这一建议给了进退维谷、心烦意乱的立项方一个良机。2018年8月，在基金会宣布立项两周年之际，立项方通知我，由于意见分歧，他们撤项撤资。凡是我组的稿子由我拿走，他们撒手不管了。

本想抽身而退，却落个烈火烧身，小算盘遇到了大手笔！

五

两年来，从立项到联络出书，立项方确实付出了很多。为了提高论文集的档次，他一开始就锁定牛津大学出版社。牛大的林先生不负所托，顶住政经双重压力，毅然接受了这个项目。

但是，这是个特殊的项目——除了学术之外，它还承载着政治意义、历史价值和当事人的信誉。这些东西，出版方没有义务替你考虑。何况，学术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更重要的是，学术著作赔钱，因此无论国内域外，出书方都要付钱给出版方（国内叫出书补贴）。也就是说，要出这种特殊书，只有两条路，一是找特殊的出版社；二是出钱，找一般的出版社。

如果我接受立项方的决定，大部分作者和评审人将空等一场。如今我不接受，则会给少部分入选的作者造成损失。立项方在香港，我在内地，各为其“主”。立项方看重的是基金会在香港的利益，我看重的是对内地作者和评审人的承诺。

所以，我在给立项方的信中说：“（你）原来的用意孔佳——找个学术出版社，展示国内的研究成果。没想到，前者否定了后者。明智的办法是保住成果，换个出版社。作者可以原谅时间后延，但不能原谅言而无信。在一般的出版社出全本，得到的是鲜花掌声和人心；在牛大出节本，得到的是抱怨和离心离德。”

立项方早就想从这个项目中解脱出来，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但是，这种解脱恐怕非其所愿——立项方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基金会多年来致力于以学术推动改革。两年前，他们怀抱着这种责任感，知难而上，出资立项。如今撂了挑子，虽说解脱了，可当事人心中应该清楚，他们撂下了的，不仅是出书，也是道义。

我早就说，不宜请丁教授做审稿人。立项方说我搞分裂，搞人身攻击。我再三请立项方把他们商量的结果发我，立项方始终不发。根据以往与他打交道的经验，我断定，他手里根本没有一个成形的方案。有的，只有他们三人商量的几条要点。这是他坚持面谈，不发电邮，说我不见面就是拒绝合作的原因。我再四请立项方向作者做解释，立项方说，他与出版社还没签订合同，出版社没有义务面对作者。出版社没义务，你立项方有义务。你作为立项出资者，有责任向作者，向评审人说明，为什么要砍下那么多文章，以及砍的理由。

六

立项方的变脸和事情的陡转，使我反躬自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把两年来的事情捋了一遍。发现我犯了两大错误：第一，没把立项方当“领导”，而当成了合作者。第二，在用人问题上，从始至终一直在跟“领导”唱反调。谁都不愿意听逆耳之言。这是人性之常，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立项方对内地的作者——这其中有20多位大学教授、研究院所的研究员，高校的系主任、二级学院的院长——毫不尊重？砍掉四分之三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肯打？对作者如此，对评审人亦然，这些评审人可是你红口白牙承诺聘请，并答应付酬的国内外知名的文革专家呀！

比较一下基金会的宣言宗旨，立项方的所作所为，就更令人困惑：基金会以推动改革开放自命，改开的要义是公正，立项方却傲居内地学者之上，眼里既无专家权威，更无作者权益。基金会以铁肩担道义自期，而立项方却化公为私，大言煌煌纪念文革，信誓旦旦出版四卷，稍有异议，即霍然变脸。不但推翻前诺，而且颠预浮夸。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立项方说，他们收到了“近百位作者的逾百篇文章”。这两个数字都是编造——我交给立项方46位作者的57篇文章。立项方不可能在这些作者之外再找到四五十位作者，再征集四五十篇文章。

基金会以推动学术进步自许，设文库，搞出版，建启蒙之牖户，成天下之公器。立项方却不以学问为重，重私人，任亲信，以香港睥睨内地为能。其道义、诚信何在？学术、公器何存？

这些困惑陪伴了我两年，直到看到香港大学里的本地学生，诅咒内地学生“死全家”“滚回中国”的时候，才豁然开朗——立项方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跟那些“黄丝”一样，都以高等华人自居。在他们看来，只要作为香港人，无论是干什么的，都高于内地众生。只要在西方拿了学位，在香港大学教书，无论是学什么专业，有没有水平，都足以指导大陆学人。丁教授之所以敢于以外行领导内行，立项方之所以食言自肥而不以为耻，予取予夺还强词夺理，就是因为“深藏在香港社会独特的集体心理背后的”“对中国母体抱有的强烈的优越感”。⁸尽管近四十年来，大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香港社会却始终沉迷在其令人骄傲的过去无法自拔，始终拒绝认识中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同时，香港社会一部分人不但沉迷于过去的优越感，还不断寻找新的优越感。”⁹确实，他们有钱（基金会），有势（一国两制的优势），不高人一等也难。

这是一种很矛盾也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一方面，立项方要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关切；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享有学术研究的“文化霸权”。一方面，他们只有依附于内地学者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他们又抱着后殖民的优越感，看不起来自母体的研究成果，以为喝了几年洋墨水，就足以成为文革研究的内行。他们很想以“大事难事看担当”的高大形象屹立于世；可一遇到实际困难，就放弃责任，牺牲诚信，落荒逃走。

⁸ 阎小骏：《香港的治与乱：2047年的政治想象》，页74，人民出版社，2016。

⁹ 同上，页172。

七

我有两条路：要么，金盆洗手，请作者找立项方。要么，为这些稿件找出路，独自联系出版社，承担出书的风险和开销。

律师告诉我，立项方与你没有一字协议，出书与你无关。

朋友启发我，把这些稿子发到《记忆》上就行了，用不着贴钱出书。

但是，有两座山，我绕不过去。首先是信用——是我发的征稿启事，是我上门催稿，是我要求作者修改修改再修改，是我在立项方的一再要求下，寻找专门人才，补写大屠杀、海外出版物、地方文革、道歉与和解等方面的文章；也是我，邀请审稿专家，并告诉他们，立项方将支付审稿费。最后还是我，为保证此文集的首发，一再劝阻稿件外流。如果我也撒手不管，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其次，是这本书在学术之外的意义。2016年5月，有司正告我，不准再研究文革。我解释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学术。约谈者拍着桌子大叫：“你你你，你糊涂呀！你还看不出来吗？文革研究就是政治！政治！！政治！！！”他一连说了三个政治，让我铭心刻骨。显而易见，这本书先天就带有政治性——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反对强权对学术研究的压迫。

2016年10月，有司再次约谈，不准我编这本书。理由是，这种书会搞乱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揪住文革不放！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也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过小日子，过好日子，研究什么不好，研究文革干吗！

这些话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本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它为做着“中国梦”的国人提供了一点理性。为总结教训，重启改革提供了一点反省。它是亲历文革的40后在学术上最后的集体发声。它前承1986、1996、2006，是历史之链中的一环，后接2026、2036、2046，是历史之梯的一阶，有了它，我们就不至于凌空蹈虚；有了它，我们庶几可以告慰于逝者，无愧于后人。

接到立项方撤项通知时，我刚从二连回到青城。长夜无眠，我知道，我只有一条路：以一己之力，自费出这四卷本。

自费出版，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受那些名牌出版社的束缚，打破学院派的清规戒律，收入那些不那么符合规范的文字——赵园的随笔式写作，吴思的纲要性文章，以及几个出版社都拒绝的评论。另外，在文章的长度上，我也可以在出版商允许的范围内，不那么刚性地限制字数。尤其是文献综述类的文章。

自费出书，也得有出版社。我在台湾秀威出过七本书，但秀威不接受此书。中研院的朋友告诉我，台湾商务要跟大陆做生意，不敢接。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有意向，我赶紧把四卷的提要和目录、作者简介呈上，中心主任要我写个导言，并且说导言不是介绍诸文大要，而是要有理论有独见。我不知道这种导言怎么写，憋了一个多月，总算拼凑了一篇。交上去之后，左等没信，右等没信，最后等来了人家不出。理由是台湾人不关心大陆事，怕赔钱。回过头再找香港，给几家熟悉的出版社写信，皆不回。最后，只好转向美国，溪流出过《记忆精选》和纪念文革四十年的书，却有问无答。岁月似水，我心急如焚——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书，本应在2016年出来，彼时已经是2018年9月。

八

友人力荐美国南方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不但条件苛刻（每本书不得超过三十万字，开本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十本样书只能寄到美国境内），而且收费奇高——每本书服务费1300美元，封面设计再加300。为了在2018年把书出出来，我将四本书的服务费交李南央夫妇（立项方给我的组稿费这时派上了用场）。在我与这家出版社的一个叫Peter王的人签订了前两卷的出版协议，南央代我给王先生寄出了支票时，我忘了古人说的“事缓则圆”。

求了多位朋友，遭到多次婉拒之后，第一卷的十本样书分成四批，辗转相识、不相识的多人之手，过关穿卡，终于安全到达。万没想到的是，这些让我日思夜盼的高价“美货”竟然令人无法卒读——正文的字号大小不一，字体或粗或细，行距有宽有窄，注释的字号与正文一般大小。连书脊上的书名都偏到了一边。我见过各种盗版书，糟成这样的书，平生仅见。

我要求美南重印样书，Peter王拒绝重印。我叫停第二卷的印刷，同时向美国消协举证投诉。美南注册所在地的阿拉巴马州的消协，在铁证面前，竟为美南说话。Peter王则给国内的作者写信，宣称：“我们在今年初是得罪了一个文革时的老红卫兵，他最近在使用文革式的龌龊手法，用造谣的方法对我们进行报复。不过清者自清，我们也不准备理会。”

千秋易过，文革罪恶难消。六十年代出生的Peter王竟把反思文革的论文集说成是老兵之作，这需要怎样的“厚黑”！一个没经历过文革的美籍华人，对大

批判运用得竟如此娴熟，这需怎样的悟性！一家自诩有 200 位忠实作者的出版商竟敢把如此劣质的出版物挂到亚马逊上向全球销售，这需要怎样的勇气！

国内朋友说，我是个超级白痴，花这么多钱跑美国去出一本运不回来的书。法国朋友说，我运气不好，遇到了一家野鸡店。美国朋友说，这种无良华商在美国并不乏见，而美国消协也并非如国人想像的那样公正无私。总之，所有的人都说我上当受骗，都劝我别跟这样的无赖生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赔了钱又误了时，“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再次盘踞枕上心头。

九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就在我向海外的朋友打听书号价格，准备自印之际，美国华忆出版社横空出世，济困扶危，质优价廉地推出这套书。无良与有德，利奴与义士，助纣为虐与替天行道，数典忘祖与家国情怀，都在这里汇聚。

在这套书的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众多朋友的帮助。第一个伸出援手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余敏玲，她帮我联络台湾的各家出版社，并给我提供台湾的注释样本，还要让她的研究助理帮我编辑论文的注释。北大法学院教授李红云，在百忙之中专程见我，为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还给我发来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法国华裔学者林洛女士以其过细的作风，为来往函件把关，协调诸方，殊为给力。而李南央女士在两难时刻的灵活果敢和勇于承担，令我深铭至感。

另外，还应该感谢那些为本书写推荐语的中外专家学者们——中共党内民主宪政派的耆宿李锐，法国高等社科院的潘鸣啸，德国科隆大学的文浩，美国加州大学的宋永毅，史丹福大学的魏昂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香港中文大学的彭丽君，等等。

还有，人大教授单少杰，北大教授印红标，理工大学教授蒋健，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山西社科院研究员丁东，中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南京大学副教授袁梦倩，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孙佳雯，以及周孜仁、孙言诚等文革学者，闻此事变，不但为我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还主动放弃稿费。虽然我并没有出书与付稿费的义务，但是他们的关切和舍己，仍旧温暖人心。

当然，编校中的疏漏瑕疵由我负责。📧

2019-10-24

【论文集第一卷】文献与综述 推荐语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不敢让人说话，其实就是保护造成浩劫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在不懈的努力下，由文革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共同撰写的“文化大革命论文集”终于要出版了，这是一个庞大群

体的呐喊：中国人决不能忘记血的教训！中国人决不允许文革的灾难重演！

——李锐

有关文革的记忆和研究，已经成为专制政权和独立知识分子之间博弈的焦点。我要强调的是：要充分认识到这场博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尽管大权在握的人有“武器的批判”，而独立学者仅有一支笔，天平仍可能导向学者一边。这套四卷本的文革研究专著历经坎坷，最终在美国出版，正是编者和作者们坚持不屈的明证。同时，它们也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发展。

——宋永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这套丛书的许多作者是中国国内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一些青年作者也在关于文革的专题研究中崭露头角。书中各章节的论述内容十分广泛，历史叙述生动详实，理论分析富含洞见，代表着中国国内文革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该书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很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美国斯坦福大学

这五十多篇文章，篇篇都高扬着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四十多位作者，人人都是鲁迅所说的，改革思想学术的“前驱和闯将”。这四卷本的论文集经磨历难，终于在文革 53 周年问世，这事实本身就说明，文革研究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是多么重要，而这部书的编撰、出版经过，也将与此书一样载入历史。

——王复兴（美）文革学者

【论文集第一卷】目录



1. 王 芳 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
2. 徐友渔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20年进展综述
3. 余汝信 文革中的军队——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4. 石名岗 文革时期的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情况综述
5. 卜伟华 各省区市地方文革简述
6. 吴 迪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26个省区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7. 周孜仁 文革集体屠杀述要
8. 余汝信 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
9. 蒋 健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10. 唐少杰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综述与评析
11. 丁 东 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
12. 杨 隽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论文集第二卷】思想与文化 推荐语：



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毛泽东文化。对这一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对一个时代的民族思想、精神、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没有此种认真、深刻的民族自我反省和批判，中国不可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也就不可能正视并改造由此形成的新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

也就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演。这一论文集将文化作为文革研究的重点，正是这一清理和批判的开始。

—— 钱理群 北京大学

何谓“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层面上如何“破旧”与“立新”？红色文化在当今中国留下哪些遗产和后遗症？从毛的著述到文革期间的地下艺术，从伤痕文学到怀旧红歌，从电影中的爱情观到知青的口述史，从官方文艺体制到私人日记，从历史文物的遭遇到革命大批判的方法，这本丰富的文集包含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讨论，对海内外研究文革的学者来说，都会成为启迪与资源。

——李洁 哈佛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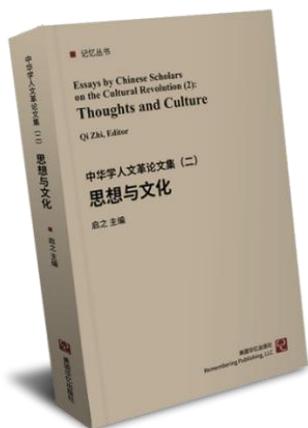
文革研究在国外从来没有真正退潮，由六七十年代的好奇推崇到八十年代的神话破灭，学者开始进行更多细致的研究，了解当年的社会和文化面貌。但随着中国近年的国力增强，文革于中国的意义在国外又成为非常重要的政治话题。可是，要好好面对这段历史，一些基本问题始终要在中国内提出，我们才可归根究底地回答、反省和前行。了解历史是所有政治实践的基础，这部文集正正是人民继续前行最实在的依据。

—— 彭丽君 香港中文大学

这部文革研究论文集是一项悲壮的社会工程。从立项选题，到落实出版，几年来遭遇诸多阻挠变故。但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蹈汤赴火，前赴后继。现在此书的编撰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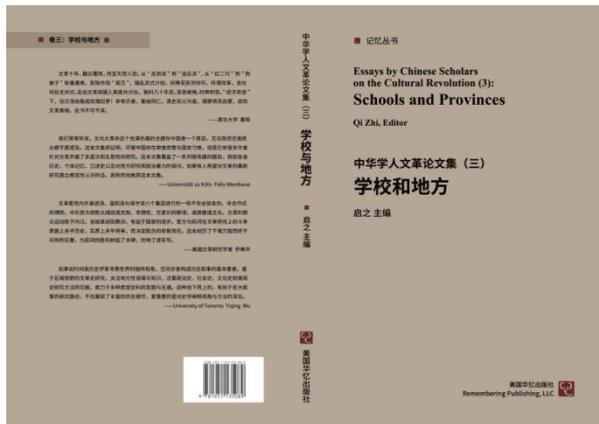
——何与怀 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

【论文集第二卷】目录



1. 单世杰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
2. 赵园 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探微
3. 徐贲 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
4. 穆德冰 道歉·追责·真相·和解：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文化遗产诤议
5. 王侍 “我”的革命——从文化历史传承的角度看文革日记修身
6. 孙佳雯 疼痛诉说与集体“苦难”记忆
——大兴安岭林场知青口述史的社会学研究
7. 于奇赫 文革时期“破四旧”运动中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与保护逻辑
——以四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为中心
8. 杨健 试论文革时期的官方艺术和国家文艺体制
9. 余敏玲 从电影看斯大林时期与毛泽东时期的爱情观
——兼论中苏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
10. 陶东风 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
11. 王爱和 无声的创造，无名的结社：记文革地下艺术
12. 姜学斋 革命大批判浅议
——方法·组织·媒体·效果
13. 金光耀 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为中心的讨论
14. 司绛 试论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母题
——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
15. 启之 《纪要》：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纲领

【论文集第三卷】学校与地方 推荐语：



文革十年，翻云覆雨，终至天怒人怨，从“走资派”到“造反派”，从“红二代”到“狗崽子”轮番遭难，剪除市场“尾巴”，搞乱苏式计划，折腾至民穷财尽。所谓改革，走向何处无共识，走出文革则时人高度共识也。孰料几十年后，昔恶被掩，时弊积怨，“经济奇迹”下，往日浩劫竟成玫瑰旧梦！幸有识者，

集结同仁，清史实以为鉴，理孽债而启蒙，欲知文革真相，此书不可不读。

——秦晖 清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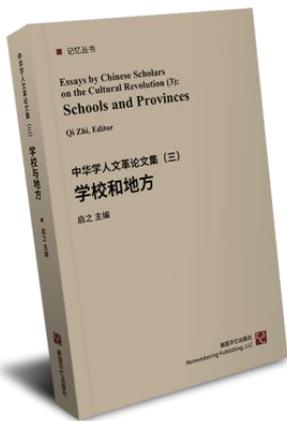
我们常常听说，文化大革命这个充满伤痛的主题在中国是一个禁忌，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不愿提及。这本文集却证明，尽管中国存在审查政策与警察刁难，但是仍有很多作者针对文革开展了多层次和反思性的研究。这本文集覆盖了一系列很有趣的题目，例如各省历史、个体记忆、口述史以及对西方研究和政治暴力的探讨。如果有人希望对文革的最新研究建立概览性认识的话，我热烈地推荐这本文集。 ——文浩（Felix Wemheue） 德国科隆大学

文革是党内外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的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中共官方把民众描述成无知、非理性、无意识的群氓，或屏蔽或丑化。文革的群众运动败于内讧。总结其经验教训，有益于国家的进步。官方与民间在文革研究上的斗争表面上关乎历史，实质上关乎将来，而决定胜负的却是现在。这本经历了千难万阻而终于问世的巨著，为民间的胜利树起了丰碑，吹响了进军号。 ——乔晞华（美）文革社会学者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学家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空间亦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基于区域视野的文革史研究关注地方性语境与知识，注重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方法的交融，致力于多种类型史料的发掘与互通。这种有别于宏大叙事框架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现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它对史学阐释视角与方法的深化。

——吴一庆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论文集第三卷】目录



1. 李清昆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
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2. 唐少杰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
述评
3. 刘 明 北师大文革造反特点简论
4. 余汝信 河北“三支两军”述略

5. 张业赏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述论
6. 崔金珂 山东文化大革命中的“右派翻案”现象
——造反干部的派性政治
7. 李 辅 “一月革命风暴”在山西文革
8. 石名岗 “文革后”的文革
——山西的“倒清查”运动
9. 董国强 李嘉树 从“夺权”到“军管”
——安徽文革运动初探
10. 刘小萌 “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
——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
11. 白 磊 革命的纷争
——1966-1968年西安造反派别的兴起与分化
12. 迟 淼 记录无名者
——《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形成过程解析
13. 周孜仁 “沙甸事件”：中国民族关系的一页痛史
14. 孙言诚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试析

【论文集第四卷】 政治与群众 推荐语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革研究论文集》一百四十多万字，洋洋大观，选题丰富。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作者是文革亲历者。他们年逾古稀，经过文革后三四十年的深思，以传承历史的责任感，述评文革的亲身经历，弥足珍贵。作者中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文革研究后继有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文革的情感纠缠，其成果更具

客观性和理性。这本书是文革研究的可喜成果。对文革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研究，是这个任务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价值就在如此。

——杨继绳 政治学及历史学家

文化大革命不但对中国历史会影响深远，也会给人类历史带来深刻的教训。中国当局怕文革的记忆会削弱自己的合法性，所以曾有一段较长的时期，文革研究只能在西方存在。但是，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学者在不畏艰难险阻开展了自己的文革研究。这四卷本论文集的问世，告诉我们，既有知识才能，又有良心和使命感的中国人没有“被失踪”。但愿他们从此站起来！

——潘鸣啸（Michel Bonnin）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长年以来，中国民间学者为研究文革做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贡献。他们鼓励亲历者回顾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说服资料收藏者，将文献贡献出来让大家分享。他们帮助下一代去了解文革。这四卷本的文革论文集，把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德国人总觉得，在面对自己不幸的历史方面，他们是令人佩服的国际模范。不对。得佩服的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努力去研究、分析、了解文革的中国同事。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彻底否定文革不仅仅要否定充斥在文革中许多最落后、最愚昧、最野蛮的观念和行为，更主要的是要从根子上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要彻底清理“红色思想文化”，彻底清算共产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这四卷本的论文集，就是中国人进行清理与清算的最新成果的汇编。它代表着中国学界的勇气和良知，凝聚着中国人的理性和反省。在文革发动五十年，官方严禁文革研究，向毛时代大踏步倒退的时候，这部论文集的意义更非同小可。

——郑仲兵 前《新观察》常务副主编

【论文集第四卷】目录：



1. 吴 思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
2. 唐少杰 革命的“革命”：简论文
化大革命的革命特色
3. 印红标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
4. 何 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
5. 郭予庆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构想的提出与终结——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
6. 越 人 文革前期（1966-1970）
毛林关系变化初探
7. 乔晞华 群众运动内讧自毁的原因和教训
8. 米鹤都 文革初期毛泽东是怎样发动群众的
——兼论红卫兵的南下兵团
9. 袁梦倩 文革的创伤记忆、修复与红卫兵暴力的忏悔
——基于“一二·五”事件亲历者的个案研究
10. 刘小萌 文革中下乡知青“非正常死亡”问题
11. 孙佳雯 黑龙江与云南兵团知青比较
12. 徐友渔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
——以《奉献》为例
13. 何 蜀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
——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14. 李 逊 被忽略的历史
——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15. 金大陆 运动、组织和事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1966. 11. 9-1967. 11. 10)解读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人：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